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清代学术概论

梁启超 著

今之恒言，曰「时代思潮」，此其道最妙于形容。……凡「思」非皆能成「潮」，能成「潮」者，则其「思」必有相当之价值，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。凡「时代」非皆有「思潮」，有思潮之时代，必文化昌进之时代也。其在我国自秦以后，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，则汉之经学，隋唐之佛学，宋及明之理学，清之考证学，四者而已。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清代学术概论

梁启超 著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代学术概论 / 梁启超著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2009

(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761-272-8

I. 清… II. 梁… III. 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概论—
中国—清代 IV. B2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27005 号

清代学术概论

作 者: 梁启超

责任编辑: 曾 倩 李曦怡

封面设计: 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 0731—88885616 (邮购)

邮编: 410006

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640×960 1/16

印张: 7.5

印数: 1—6,000

ISBN 978-7-80761-272-8/G·723

定价: 14.00 元

承印: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 0731-88884129

整理说明

一、丛书着力于“学术”与“文化”两方面，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，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。

二、丛书之收书范围，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，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。然某些著作之成形，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，因其有重要地位，亦酌情收入。

三、文、史、哲之分，原系西洋通则，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，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，而是根据整理进度，顺次出版。

四、丛书所收诸书，原版均为繁体竖排，在其流布过程中，亦有版本差异、文字错讹等现象，为方便读者，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：

1.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，竖排改为横排（原书中“左表”、“右表”、“左文”、“右文”均改为“上表”、“下表”、“上文”、“下文”），但为充分尊重原著，原书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凡底本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，皆一仍其旧。

2. 凡排印误刻者，如日曰、己巳巳、戊戌戌之类，均径改，不出校记。

3.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，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。

4.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，原书以夹注出之，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，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。

5. 各书附“后记”一篇，说明著者爵里、版本流布、各界评论等情况，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。

古人云：“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。”吾人虽勉力为之，而乖漏难免，还祈方家教正。

序

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，乃征序于新会，而新会之序，量与原书埒，则别为清学概论，而复征序于震。震惟由复古而得解放，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，清学之精神，与欧洲之文艺复兴，实有同调者焉。虽然，物质之进步，迟迟至今日虽当世士夫大声以倡科学，而迄今乃未有成者，何也？

且吾于清学发达之历史中亦有数疑问：

一、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，适当明清之际，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，明之后，清之帝皆是也，清祖康熙，尤喜其算，测地量天，浸浸乎用之实地矣。循是以发达，则欧学自能逐渐输入，顾何以康熙以后，截然中辍，仅余天算，以维残垒？

二、致用之学，自亭林以迄颜李，当时幾成学者风尚。夫致用云者，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，循是以往，亦物质发达之门，顾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者，则大盛，而其余独不发达，至高者，勉为附庸而已？

三、东原理欲之说震古砾今，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

也。“遏欲之害，甚于防川”，兹言而在中国，岂非奇创。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，不惟无赞成者，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，又何故？

四、迨至近世，震于船坚炮利，乃设制造局，译西书，送学生，振振乎有发达之势矣。顾今文学之运动，距制造局之创设，后二十余年，何以通西文者，无一人能参加此运动。而变法，维新，立宪，革命，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，夺格致化学之席；而纯正科学，卒不扬？

此其原因有原于政治之趋势者，清以异族，入主中夏，致用之学，必遭时忌，故藉朴学以自保，此其一也。康熙末年，诸王相竞，耶稣会党太子，喇吗党雍正（此言夏穗卿先生为我言之），既失败于外，又遭谗于罗马。而传教一事乃竟为西学输入之一障害。此其二也。有原于社会之风尚者，民族富于调和性，故欧洲之复古为冲突的，而清代之复古，虽抨击宋学，而凭圣经以自保，则一变为继承的，而转入于调和，轮廓不明了此科学之大障也。此其三。民族尚谈玄，艺术一途社会上等诸匠人，而谈空说有者，转足以自尊。此其四。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，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，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，则受外界经济之影响，实利主义兴，多金为上，位尊次之，而对于学者之态度，则含有迂远不适用之意味，而一方则谈玄之风犹未变，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。有以异乎？无以异乎？此则愿当世君子有以力矫之矣。

民国十年正月二日 蒋方震

自序

(一) 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：其一，胡适语我：晚清“今文学运动”，于思想界影响至大；吾子实躬与其役者，宜有以纪之。其二：蒋方震著《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》新成，索余序，吾觉泛泛为一序，无以益其善美，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，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。乃与约，作此文以代序。既而下笔不能自休，遂成数万言，篇幅幾与原书埒。天下古今，固无此等序文。脱稿后，只得对于蒋书，宣告独立矣。

(二) 余于十八年前，尝著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刊于《新民丛报》，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，章末结论云：

“此二百余年总可命为中国之‘文艺复兴时代’；特其兴也，渐而非顿耳。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，至今日而葱葱郁郁，有方春之气焉。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，抱无穷希望也。”

又云：

“有清学者，以实事求是为学鹄，饶有科学的精神，而

更辅以分业的组织。”

又云：

“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，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，倒卷而继演之；如剥春笋，愈剥而愈近里；如啖甘蔗，愈啖而愈有味；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。此现象谁造之？曰：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。”

余今日之根本观念，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；惟局部的观察，今视昔似较为精密。

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，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——故今全行改作，采旧文者什一二而已。

（三）有清一代学术，可纪者不少；其卓然成一潮流，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，在前半期为“考证学”；在后半期为“今文学”；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。故本篇所记述，以此两潮流为主，其他则附庸耳。

（四）“今文学”之运动，鄙人实为其一员，不容不叙及。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，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。其批评正当与否，吾不敢知；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，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。

（五）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，与夫极尊敬之师友，皆直书其名，不用别号，从质家言，冀省读者脑力而已。

（六）自属稿至脱稿，费十五日。稿成即以寄《改造杂志》应期出版，更无余裕覆勘，舛漏当甚多，惟读者教之。

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 启超识

第二自序

(一) 此书成后，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；而蒋方震、林志钧、胡适三君，各有所是正；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。三君之说，不复具引，非敢掠美，为行文避枝蔓而已。丁敬礼所谓：“后世谁知定吾文者耶”；谨记此以志谢三君。

(二) 久抱著《中国学术史》之志，迁延未成。此书既脱稿，诸朋好益相督责，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，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，亦可唤起学问上兴味也。于是决意为之，分为五部，其一：先秦学术，其二：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，其三：隋唐佛学，其四：宋明理学，其五：则清学也。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，名曰《中国佛学史》，草创正半。欲以一年内成此五部，能否未敢知；勉自策厉而已。故此书遂题为《中国学术史第五种》。

(三) 本书属稿之始，本为他书作序，非独立著一书也；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。既已成编，即复怠于改作；故不名曰《清代学术史》而名曰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：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。五部完成后，当更改之耳。

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启超记

目 录

CONTENTS

序	1
自序	3
第二自序	5
一	1
二	4
三	8
四	10
五	14
六	17
七	21
八	24
九	27
十	30

十一	34
十二	42
十三	46
十四	48
十五	53
十六	55
十七	58
十八	61
十九	63
二十	66
二十一	68
二十二	70
二十三	73
二十四	76
二十五	79
二十六	82
二十七	86
二十八	90
二十九	92
三十	95
三十一	98
三十二	101
三十三	103

今之恒言，曰“时代思潮”，此其语最妙于形容。凡文化发展之国，其国民于一时期中，因环境之变迁，与夫心理之感召，不期而思想之进路，同趋于一方向；于是相与呼应汹涌，如潮然；始焉其势甚微，幾莫之觉；寢假而涨——涨——涨，而达于满度；过时焉则落，以渐至于衰熄。凡“思”非皆能成“潮”，能成“潮”者，则其“思”必有相当之价值；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。凡“时代”非皆有“思潮”，有思潮之时代，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。其在我国自秦以后，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，则汉之经学，隋唐之佛学，宋及明之理学，清之考证学，四者而已。

凡时代思潮，无不由“继续的群众运动”而成。所谓运动者，非必有意识，有计画，有组织；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。其参加运动之人员，每各不相谋，各相不知；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，各各不同；所采之手段亦互异。于同一运动之下，往往分无数小支派，甚且相嫉视相排击。虽然，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，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；此种观念之势力，初时本甚微弱；愈运动则愈扩

大，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。此观念者，在其时代中，俨然“现宗教之色彩”；一部分人，以宣传捍卫为己任，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；及其权威渐立，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；忘其所以然，而共以此为嗜；若此者，今之译语，谓之“流行”，古之成语，则曰“风气”；风气者，一时的信仰也；人鲜敢婴之，亦不乐婴之，其性质较比宗教矣。一思潮播为风气，则其成熟之时也。

佛说一切流转相，例分四期，曰：生，住，异，灭；思潮之流转也正然，例分四期；一：启蒙期生，二：全盛期住，三：蜕分期异，四：衰落期灭，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，其发展变迁，多循斯轨。启蒙期者，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；旧思潮经全盛之后，如果之极熟而致烂，如血之凝固而成瘀，则反动不得不起；反动者，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；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，故此期之重要人物，其精力皆用于破坏，而建设盖有所未遑；所谓未遑者，非搁置之谓；其建设之主要精神，在此期间必已孕育，如史家所谓“开国规模”者然；虽然，其条理未确立，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，弃取未定；故此期之著作，恒驳而不纯；但在般乱粗糙之中，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；此启蒙期之特色也；当佛说所谓“生”相。于是进为全盛期；破坏事业已告终，旧思潮屏息慑伏，不复能抗颜行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，思想内容日以充实；研究方法，亦日以精密；门户堂奥次第建树，继长增高，“宗庙之美百官之富”粲然矣；一世才智之士，以此为好尚，相与淬厉精进；阉冗者犹希声附和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；此全盛期之特色也；当佛说所谓“住”相。更进则入于蜕分期；境界国土，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；然学者之聪明才力，终不能无所用也；只取得局部问题，为“窄而深”的研究；或取其研究方法，应用之于别方面；于是派中小派出焉；而其时之环境，必有以异乎前；晚出之派，进取气较盛，易与环境顺应，故往往以附

庸蔚为大国；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，或且骎骎乎夺其席；此蜕化期之特色也；当佛说所谓“异”相。过此以往，则衰落期至焉：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，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；陈陈相因，固已可厌；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，则先辈已潜发无余；承其流者，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；且支派分裂，排轧随之，益自暴露其缺点；环境既已变易，社会需要，别转一方向；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，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，而豪杰之士，欲创新必先推旧，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；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，而此思潮遂告终焉；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，当佛说所谓“灭”相。

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“思潮”者，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；而有清三百年，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。

“清代思潮”果何物耶？简单言之：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，而以“复古”为其职志者也；其动机及其内容，皆与欧洲之“文艺复兴”绝相类；而欧洲当“文艺复兴期”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，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。其盛衰之迹，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。

其启蒙期运动之代表人物，则顾炎武、胡渭、阎若璩也。其时正值晚明王学极盛而敝之后，学者习于“束书不观游谈无根”，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；炎武等乃起而矫之，大倡“舍经学无理学”之说，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，直接反求之于古经；而若璩辨伪经，唤起“求真”观念，渭攻“河洛”，扫架空说之根据，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。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，尚有数种方向：其一，颜元、李塨一派，谓“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，亦不当求诸书册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”；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，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。其二，黄宗羲、万斯同一派，以史学为根据，而推之于当世之务；顾炎武所学，本亦具此精神；而黄、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，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；同时顾祖禹之学，亦大略同一径路；其后则衍为全祖望、章学诚等，于清学为别派。其

三，王锡阐、梅文鼎一派，专治天算；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。此诸派者，其研究学问之方法，皆与明儒根本差异；除颜、李一派中绝外，其余皆有传于后；而顾、阎、胡“尤为正统派”不桃之大宗。其犹为旧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，则有孙奇逢、李中孚、陆世仪等；而其学风已由明而渐返于宋；即诸新学家，其思想中，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；故此期之复古，可谓由明以复于宋，且渐复于汉唐。

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，则惠栋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也；吾名之曰正统派。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：一，启蒙派对于宋学，一部分猛烈攻击，而仍因袭其一部分；正统派则自固壁垒，将宋学置之不议不论之列。二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，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；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，为经学而治经学。正统派之中坚，在皖与吴；开吴者惠，开皖者戴。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，其弟子有江声、余萧客，而王鸣盛、钱大昕，汪中、刘台拱、江藩等皆汲其流。戴震受学于江永，亦事栋以先辈礼；震之在乡里，衍其学者，有金榜、程瑶田、凌廷堪、三胡——匡衷、培塿、春乔——等；其教于京师，弟子之显者，有任大椿、卢文弨、孔广森、段玉裁、王念孙，念孙以授其子引之，玉裁、念孙、引之最能光大震学，世称戴、段、二王焉。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，不喜以师弟相标榜；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，更无派别可言也。惠、戴齐名，而惠尊闻好博，戴深刻断制，惠仅“述者”而戴则“作者”也；受其学者，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；故正统派之盟主必推戴。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，不可数计；而阮元、王昶、纪昀、毕沅辈，皆处贵要，倾心宗向，隐若护法，于是兹派称全盛焉。其治学根本方法，在“实事求是”“无征不信”；其研究范围，以经学为中心，而衍及小学，音韵，史学，天算，水地，典章制度，金石，校勘，辑逸等等；而引证取材，多极于两汉；故亦有“汉学”之目。当斯时也，学风殆统于一；启蒙期之宋学残绪，亦